

汪暉：秩序還是失序？——阿明與他對全球化的看法

（本文轉自人文與社會）

應 NIAS 之邀，我的北歐之行的第一站是丹麥的哥本哈根。NIAS 是北歐亞洲研究院(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的簡稱，地處哥本哈根市東南部的 Amager 島上，那裡是哥本哈根大學的人文學院。但 NIAS 並不是哥本哈根大學的機構，而是一個由北歐五國政府資助的獨立研究院。NIAS 的院長 Thommy Svensson 教授是研究東南亞問題的人類學家，他同時還是歐洲科學基金會亞洲委員會和歐洲東南亞學會的主席，這顯示了 NIAS 在歐洲的學術地位。

剛到丹麥時，Thommy 形象地介紹說，NIAS 是一個以北歐二十多所大學為基地的傘狀組織，它從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視野研究亞洲社會與文化，致力於在專門的學術分科與綜合的研究之間建立某種平衡。這一點也是我最喜歡的。現代大學中的學術分科是歷史的產物，許多當代問題和當代的學術已經難以在傳統的分科中得到說明，近年在美國興起的所謂“文化研究”可說是一種對於現代專門化的學術分科的反平衡。比如國內討論的越來越多的“全球化”問題，就不可能在單一視野中解釋。

說來真巧，臨行前有一次與朋友討論新馬克思主義問題，他提到阿明的理論，語焉未詳。此次適逢聯合國主持的環境與社會發展首腦會議及非政府組織會議在哥本哈根召開，NIAS 邀請與會的阿明教授演講。他的議題從一個特殊方面涉及了所謂“全球化問題”。

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埃及人，現任設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的第三世界論壇研究所的領導人，以“依附理論”著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五十年代在巴黎接受教育期間，他是來自第三世界的新一代的“批判的知識份子”之一。這些“批判的知識份子”共同創造了一個富有成果的國際氛圍，自那時起，在這個氛圍中已經產生了一些最傑出的法國和國際的經濟學家和發展學者。

阿明的興趣一直集中于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關係。早在一九五七年作博士論文時，他通過積累過程的分析論及這種關係的發展，指出它日益被組織在一種全球化的網路之中。大約十年之後，隨著他的著作《世界規模的積累》(L'Accumulation a L'échelle Mondiale)的發表，他在發展理論研究內部，為一個全新的學派找到了基礎。在這個關於全球資本積累的分析中，這一過程的前提、內容和方向被視為理解不同發展過程和南北社會結構的差異的關鍵性概念。

通過對“不發達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位置的分析，阿明形成了他的“脫鉤”理論 (the theory of delinking)。這個理論的主要看法是，如果“不發達國家”要獲得“發展”，他們就必須更加獨立，並以自足為方向整合他們的經濟活動。這意味著與殖民主義創造的國際勞動分工的決裂，還意味著建立以滿足自己的內部需要為主要目標的社會。

我懷疑他的這個理論曾經受到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發展理論的影響，因為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到過中國。阿明在討論中國改革的成功方面時，特別強調這個改革是以毛澤東在五十一—七十年代的成就為基礎的，並以此解釋印度未能獲得中國的發展速度的原因。

阿明的理論不僅在中國可能引來批評，即使在西方的發展研究中也是最引起爭論的一部分。然而這並未削弱他的理論的重要性，因為甚至他的論敵也使用他的關鍵概念。他就國際危機和世界經濟寫下了大量論著，最新的有《歐洲中心主義》 (Eurocentrism, 1989)和《無序的帝國》 (Empire of Chaos, 1994)等。阿明在 NIAS 的演講題為《依附理論的狀況與亞洲》 (The State of Dependency Theory and Asia)，其主要的思想見於他晚近的兩篇論文，一篇題為《全球兩極化的未來》 (The Future of Global Polar-ization)，另一篇是《重新開始發展的條件》 (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我自己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國際政治學家，阿明的理論之引起我的興趣，是因為他的論題與國內正在進行的所謂“全球化”的討論有關，而整個的視野完全不同。換言之，我不是作為專家參與這個討論，而是作為一個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作為一個關心當代社會現實的知識份子思考我們生活的境遇。這裡以介紹為主，自然不是給專家看的。

據我所知，國內有關“全球化”的討論與沃勒斯坦等西方學者的理論有關，但又很不相同。從內容上說，對全球化的討論涉及跨國公司、國際市場和國際組織的活動及其對民族國家體系的瓦解，也涉及到資訊和文化的國際化，個別社會學家則討論了消費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在文化領域已經有人把這個全球化看作是通達“大同”世界的可能性。我甚至聽到有人將全球化與康得的“永久和平”聯繫起來。儘管對於全球化有不同的評價，但沒有人懷疑這個過程的必然性。對於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角色，或悲觀或樂觀，但在確認中國必須面對並進入這個世界性的競爭體系方面則沒有分歧。悲觀和樂觀的分歧來源於這樣一種判斷：中國有能力進入這個通向未來的全球歷史嗎？

阿明的觀點完全不同。無論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贊同或反對他的觀點，至少我們可以說他的理論提供了看待當今世界及其發展方向的一個特殊角度。阿明所

以要討論“依附理論”與亞洲的關係，是因為亞洲、特別是中國和東南亞的現代化經驗對這個理論提出了挑戰。

據我所知，依附理論是以拉美的經驗為背景而產生的。在這些國家，國內資本、國家機器和國際資本構成了一種三角聯合(tripple alliance)，這是因為在拉美的社會結構中，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由同一群人構成。這些人從外國銀行獲得貸款，又將生產獲得的錢大部存入外國銀行，只有很少部分用於經濟發展。當國內經濟惡化，通貨膨脹時，這些依靠美元生活的精英從中得到的是好處，而沉重的經濟負擔和還債壓力最終落在百姓頭上。在這個意義上，落後國家不僅在經濟上不能獲得發展，而且國家的自主權也受控於外國資本。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阿明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只有在與國際資本“脫鉤”的情況下才能獲得發展。

然而，在近二十年中，中國以開放的方式獲得了發展，中國政府依然保持著相當的控制能力；東南亞國家也有相似的經驗。作為一種普遍主義的理論模式，阿明必須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對依附理論重新解釋。他當然承認中國經驗和東亞經驗的特殊性，但是他並不認為依附理論就因此沒有解釋力。問題是如何解釋新的全球關係，其中關鍵的問題是新的全球秩序是否提供了解決經濟政治不平等的條件？所謂全球化是“全球秩序”(globe order)還是“全球失序”(globe disorder)？阿明認為，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是整個歷史的特徵，但只是到了現代，兩極化才伴隨著整個世界捲入資本主義過程而成為內在的特徵。他將這個現代(資本主義)兩極化的過程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工業革命前的商業主義時期(一五〇〇——一八〇〇)，其特徵是以大西洋為中心的商業資本的支配地位和邊緣區域(美洲)的製造；第二個時期是產生於工業革命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古典模式(一八〇〇——二戰結束)，與之相應的是兩個後果：1.亞洲(日本是一個例外)、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邊緣化，它們通過農業和礦業的生產而加入到全球勞動分工之中；2.以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體系為其形式的工業體系的形成。這兩個方面同時說明了民族解放的意識形態的主要特點：工業化的目標成了解放、進步的同義詞和“趕超”的手段；在資本主義中心啟發之下以建立民族一國家為目標。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接受的。第三個階段(一九四五——)是邊緣地區在不平等條件下進行工業化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伴隨著民族解放運動，亞洲和拉美國家重新獲得了政治主權。同時，自足的民族工業體系逐漸瓦解並被重組為一體化的世界生產體系的構成要素。

這些轉化過程的積累最終導致了戰後世界體系的均衡狀態的解體，在阿明看來，這個全球化的過程並沒有產生以兩極化的新形式為特徵的世界秩序，毋寧是

導致了“全球失序”(globe disorder)。這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它並沒有適應生產全球化的新的需求發展出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社會組織的新形式；

它並沒有發展出能夠適應亞洲和拉美等邊緣地區的興起的政治、經濟關係；

它也沒有發展出一個能夠將非洲包括在內的新關係，後者至今仍在競爭性的工業化過程之外。這也是歐洲統一市場和相應的政治結構難以產生的根源。

正是從這些方面出發，阿明試圖揭示被所謂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假像所掩蓋的歷史圖景。值得注意的是，阿明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分析並沒有集中於流行的霸權概念，因為他認為霸權概念不僅過於含混，而且世界霸權——如美國伴隨著全球化過程越來越脆弱，夥伴之間的衝突將導致霸權的結束。

在討論世界體系的新的特徵時，阿明提醒我們要注意兩個新的因素：

1、自我中心的民族—國家受到損害，伴隨著政治社會控制的弱化，這導致了再生產的場所與積累之間的關係的解體。

2、工業化的中心與非工業化的邊緣之間的對比瓦解了，出現了兩極化的新的方面。從理論上說，阿明拒絕用所謂“理性化”(市場的客觀規則)為標準衡量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競爭中的競爭力，因為他把這種競爭力看作是由許多經濟、政治和社會因素構成的複合物。

他用所謂資本主義中心的“五大壟斷”向整個社會理論提出挑戰，這就是：

- 1.技術的壟斷，
- 2.世界範圍的金融市場的金融壟斷，
- 3.自然資源的壟斷，
- 4.媒體和傳播的壟斷，
- 5.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

這五大壟斷作為一個整體規定了全球化的價值規則在其中運作的框架。所有這些方面瓦解了邊緣地區的工業化的影響，降低了他們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過分地估價了中心從中得益的這些新的壟斷活動的預定價值。其結果是導致了較之以往更不公平的世界規模的分配關係，這個不平等的等級結構將邊緣地區的工業降到次要地位，使他們成為承包者。這就是兩極化的新的基礎和未來形勢的預兆。阿明在他的演講中不僅一再重申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聲明自己是一個普遍主義者。他的這些看法引起了參加討論的許多人的爭議。我的房東 Irene 女士是這次演講會的主持者，她是一位越南問題的專家。她一再地表示出對阿明的理論的興趣，但也對二十世紀末年的“大理論”(Grand Theory)和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表示懷疑。但是，阿明的普遍主義可能僅僅意味著他覺得必須在一個廣泛得多的

範圍內討論世界問題，並把這種問題置於普遍聯繫的視野之中。這種理論企圖使得他的理論在許多局部細節上不能充分展示問題的複雜性。Irene 告訴我，阿明甚至寫過一本有關中國、越南的書，但寫得不好。不過，所有這些都不能反過來說明在一個整體性的層次上思考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在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所謂總體性問題即普遍聯繫的問題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理論問題，但每當有人試圖面對這個問題，總是招來批判。那麼，作為馬克思主義和普遍主義者的阿明是怎樣給出他的方案的呢？阿明認為，“經由市場而全球化”是一個反動的烏托邦。為了反對這個反動的烏托邦，就必須在社會主義視野內發展出一種可供選擇的人道主義方案。這個方案就是建立一種全球政治體系。如果說民族國家曾經歷史地代表國內市場的框架，而不只是這個市場的調度場所，那麼這種全球政治體系也不是全球市場的僕從，而是用於規定這個市場各種參數。這個全球政治體系將負擔這樣四個方面的責任：

- 1.組織全球性的裁軍；
- 2.在平等的狀況下組織對地球資源的開發；
- 3.在各個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地區間協調開放而靈活的關係；
- 4.在傳播、文化和政策等領域協調處理全球 / 國家的辯證關係。

在阿明看來，舊的世界體系的瓦解並未為新的秩序做好準備，當代的潮流毋寧是與上述方向完全相反的。許多人用“自我調節的市場”的陳舊意識形態對這種混亂狀態加以合法化，這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正是問題本身。歐洲統一計畫在今天遇到的問題證明了這種“市場決定論的全球化”只是死路一條。

值得注意的是，阿明雖然不用霸權作為他的主要解釋工具，但實際的世界狀況——如美國在拉丁美洲、海灣地區的形式不同的存在——使他不能不考慮霸權問題。歐洲統一計畫的受阻可能導致人們選擇“德國軸心的歐洲”的計畫，但在現實條件下，無論哪種選擇都不可能脫離美國的軌道。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許多人將人口最多的亞洲視為下一個可能的霸權。但是，阿明認為亞洲的情況十分不同，例如日本的成功使人們常常忽視其經濟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根源於它對美國的依賴。設想日本成為地區霸權似乎沒有多大的道理，因為中國、韓國都不會接受對於日本的附庸地位。在這樣的條件下，亞洲內部的力量平衡就依賴於這個地區的外部力量——美國。阿明預言說，亞洲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將得到加強，美國與中國的對抗將是未來的主要矛盾。美國將如何面對亞洲的興起？這將是各種問題中的首要問題。資本主義體系的支配邏輯是將這種中心 / 邊緣的兩極化永久化。也許有人認為兩極化是一種自然的法則，但阿明爭辯說：被資本主義擴張邊緣化的人民為拒絕接受這樣的命運已經奮鬥了超過半個世紀，在未來將

越來越不願接受這種命運。我國和俄國革命就是以邊緣人民的反抗為基礎的超越這種體系的努力，在今後這樣的努力將會獲得新的形式。他認為他的人道主義反應是理想主義的，但卻不是烏托邦，相反，這是唯一現實的選擇。這就是通達新的全球社會主義的方向。作為一種準備，各種思想的和政治的力量必須重新組合以對抗再生產資本主義的五大壟斷，進而創造“相互調節”的條件。

在這樣的鬥爭中，人們必須重新考慮意識形態的和文化的前沿問題：1. 普遍 / 特殊的辯證法； 2. 政治民主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3. 所謂經濟效率(市場)與平等、博愛的價值的辯證法； 4. 按照上述問題界定全球社會主義的目標。在政治方面，人們必須發展真正民主的世界組織形式，以便在平等的基礎上重構經濟關係。而當務之急就是在大的區域的基礎上重組全球體系，這些區域將分散的邊緣組織到一起；拉美、非洲、東南亞，以及中國和印度。這個重組過程也不排斥歐洲和前蘇聯國家。當然這個轉換過程需要它的基礎，如果沒有在現存的民族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的和社會制度的改變，任何有關全球化和兩極化的討論都沒有意義。

但是，阿明並沒有指明這些變化賴以發生的條件和制度基礎，這對於一個試圖在總體的層次描述問題的人來說，毋寧是過於複雜而多面的問題。阿明的理論在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方面是深刻的，但對未來的預言似乎仍然空洞。就我個人的感覺來說，阿明很少提及“兩極化”在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形態(至少在演講中是如此)，而這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特別關注的問題。換言之，“兩極化”發生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次，而不僅僅發生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的領域。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發展已經使得世界體系的格局發生重要的變化。這些新的資本主義中心是否會與非洲和拉美的窮國相互配合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我從阿明的理論中深刻地感覺到第三世界學者正在把中國及東亞當作一個第三世界的例外看待。但是，這個例外的程度到底如何？在中國經濟全面進入全球市場的條件下，中國的情況與前十年有多大程度的差別？當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儘管有其脆弱性)鼓舞了人們對全球化的信心時，中國學者似乎也有必要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思考當代問題：不僅以效率這一資本主義規則為軸心解釋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性，而且是建立不同於所謂理性化的視野來討論國際關係和國內關係領域裡的正義、公平與效率及其相互關係問題。